

诸葛亮首次北伐新议

尹韵公

关键词：三国时期 诸葛亮 北伐 争鸣

中图分类号：E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03)03—0071—07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博士，在本文中“推倒旧论，另起笔端”，以新的视角纵论诸葛亮首次北伐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体现了作者“思接千载，近鉴毫端”的求学治史方法。

诸葛亮数度北伐之事，已是众所周知。近重翻三国史籍，沉浸品咂，含英咀华，再思前贤精识，颇感妙论高远，却又略嫌不足。固然，北伐是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旗之下进行的军事行动。然而，屡试不爽的史实告诉我们，向来以表象的名义展开的行动，总是掩盖着若干不能以名义展开的东西；恰恰正是这些深藏不露的非名义的东西，在有力地推动着和左右着事物的发展进程。由此看来，北伐决不单纯只是一般性的军事行动，在它的背后必然蕴含着许多深刻而重大的因素，包括政治的、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和个性性格的等等。揭示这些矛盾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北伐的丰富内涵，而且也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而准确地认识北伐及其发起者。本文的考察重点将放在矛盾关系表现最为突出和集中的首次北伐。

一、诸葛亮“受命托孤”的历史真相

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地区的行阳（今陕西勉县），准备北伐。临行前，诸葛亮发表了千秋凛然的《出师表》。对于《出师表》，历来赞誉甚多。然而，在笔者看来，《出师表》的字里行间所埋藏着的一些极富政治价值的密码式信息，直到今天尚未完全破解出来。对此，笔者很奇怪，依历代中国文人的聪明和精细，应该说破译这些密码式信息是毫不费劲的。莫非是为尊者讳的心理在作祟。既然已把诸葛亮抬到昆仑般的高度，那么，有损于或可能有损于他名声的东西，要么故意装作视而不见，要么有意地掩饰。笔者认为虽然这样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确实起到了维护诸葛亮形象的作用，但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人们未能全方位地多侧面地认清诸葛亮的真实面目，也因此妨碍了人们对北伐、乃至对整个三国史的真正透视。

从《出师表》中时常冒出的一些不谐音符可以看出，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关系是相当微妙的。譬如，诸葛亮说：“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强调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意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暂且不究诸葛亮的这些说法是否有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么样，“不宜”怎么样，其口令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像上级对下级的训词，犹如一个严肃的父亲在冷峻地调教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府中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和等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严重地违反了蜀汉王朝及其封建体制的朝廷纪律和政治秩序。诸葛亮连皇帝都敢教训，对其他手下大臣那就更不用说该是怎样地张狂了。他的霸道和专横，不是可以窥《出师表》之一斑而见其全貌了吗？

或许有人说，诸葛亮有托孤之命，刘备生前亦曾叮嘱刘禅兄弟以“父事丞相”。但是，即便如此，诸葛亮也不能肆意践踏刘备的信任，目无君主，一手遮天。何况刘备生前还要求刘禅“与丞相共事而已”，即并没有让刘禅把所有权力都拱手交给诸葛亮而自己撒手不管。从这个角度讲，诸葛亮显然是违背了刘备的临终遗言。或许还有人说，刘备不是曾说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华阳国志》卷六）吗？对刘备的这番话，笔者是这样理解和分析的：

第一，从蜀汉政权的结构背景看，它是由三大势力集团组成，即刘备所属的荆楚集团，占据着政权的主导地位；而原刘璋所属的东州集团和当地的益州土著集团

分别居于第二、第三把交椅。由于刘备采取了团结和拉拢东州集团,争取益州土著集团的方针,故刘备在世时,三大势力集团基本上相安无事,但各大势力集团的利益摩擦和矛盾冲突并没有完全消除,事实上也无法消除。刘备夷陵战败后,荆楚集团元气大伤,刘备一怕曾与之拼死争夺益州最高领导权的东州势力集团不甘于“二把交椅”的地位,趁机翻转,重新夺回失去的最高领导权;二怕排外性强烈的益州土著集团趁机举旗造反,一如他们过去反抗东州集团那样(事实正是如此。汉嘉太守黄元听说刘备病重于永安,即起兵闹独立,诸葛亮赶紧派兵镇压下去。刘备死后,又发生数起益州土著集团叛乱的事件)。故此,刘备担心刘禅控制不住局面,便从最坏打算,希望届时诸葛亮能够作为荆楚集团的忠实代理人,挺身而出,取刘禅而代之。这样做,既可以保住刘备家族的利益,又可以保住整个荆楚集团的利益。需要指出的是,在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三国时代,一个势力集团或政治实体的首领,由于本人的软弱或无能而被强有力的下属所排挤、放逐和取代之类的事情,是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因为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个势力集团的整体利益高于一个家族的利益,只有保住了整个势力集团的利益,才能最终保住家族的利益。根据这种历史的大背景来考察刘备的“君可自取”之说,实际上对诸葛亮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和特别意义。

第二,从刘禅的自身条件看,并不存在才与不才的问题。刘禅即位时,年已17岁。他可能天赋不高,但也不笨。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夸赞他“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三国志·蜀书·刘备传》注引《诸葛亮集》),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诸葛亮首次北伐之年,刘禅正值青春有为的22岁之际。按理说,诸葛亮应当还政于刘禅,但诸葛亮揽权心甚,他不愿意让权和放权,更不愿意、甚至想都没想过把刘禅从一个“实习”皇帝辅佐成一个“正式上岗”的皇帝。他从没有为此努力过,因为查遍史书也找不到这方面的史料根据,故诸葛亮临终之前,刘禅始终不能亲理朝政。从诸葛亮来讲,倡导和实施北伐,正是他揽权和抓权的大好时机。在北伐中原、光复汉室的极为冠冕堂皇的号召下,谁还敢反对诸葛亮的集权呢?谁还能够找出让诸葛亮交权或放权的借口和理由呢?北伐开始后,诸葛亮统率大军长期驻扎汉中地区而很少呆在成都,不正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吗?依诸葛亮的性格分析,他不可能自己坐镇成都,而把蜀汉政权的大部分精兵委托给他人指挥。否则,他本人的军事才能又怎能显现出来呢?

二、诸葛亮与李严的权力之争

当然,诸葛亮决策北伐的考虑,还有与李严权力之争的因素。这是因为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实际上是

两人,即诸葛亮和李严,前正后副。

李严原是刘璋所属东州势力集团的代表人物,当刘备入蜀时,李严阵前投降。刘备入成都后,任李严为太守、兴亚将军。李严后来在平反乱中,屡建战功,表现出果断的谋略能力和突出的军事才干,被加封为辅汉将军。《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说: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就是说,李严在刘备逝世前的一段时间内,位置相当显赫,执掌着蜀汉军事大权。这也许是特殊的情况所造成,因为刘备伐吴,永安是最重要的军事重镇,这里既是蜀军伐吴的出发点,又是蜀军防止吴军报复性入侵的最前线。刘备败退于此后,首先召李严到永安宫,“拜尚书令”,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刘备更加了解和信任李严,授之以军事大权。然后,再召诸葛亮来永安,确立了两人的政治地位和位次。按刘备的设想:由诸葛亮主政,李严掌军,一文一武,共同支撑蜀汉大局。所以,在蜀汉政权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刘备想到了李严,让他“统内外军事”,列为极具信任的托孤大臣之一。

诸葛亮聪明过人,不可能不了解刘备的这番良苦用心。然而,在处理与李严的关系上,诸葛亮显然又是严重地违背了刘备的意愿。刘备永安病逝后,李严留在永安,而诸葛亮则借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开府治事”,独揽蜀汉的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而“受遗诏辅少主”的李严却被留在永安,远离和告别了政治权力中心成都,影响被限制在川东一隅。

此时,自称“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的诸葛亮,刚刚上台不久就破坏了刘备预先安排的政治格局,不仅将政治权力理所当然地拿在手中,也从李严那里不明不白地夺走了军事权力。曾经一度作为军事重镇的永安随着刘备的逝世和吴蜀重新结盟,其地位亦随之下降,永安这个地方也不适合让李严这样的托孤大臣来担任最高长官。正因为如此,李严不久便“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但是,永安军事地位的下降,不等于非削去李严的军权不可,也不等于李严不适合执掌军权。可是,诸葛亮把持朝中大权后,李严作为托孤大臣没有获得他应有的地位、待遇和荣誉,没有进入他本来最有资格进入的权力核心圈,更没有作为主要副手参与决策,治理朝政。李严被诸葛亮排斥在外,在南征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中,竟然没有任何有作为的表现,这与其托孤副手的声名是极不相称的。

既然李严能为刘备所看中,这也说明李严决非等闲之辈。诸葛亮独揽军政大权后,调走了永安的相当军事力量。李严为此不满,嫌留下的兵少,且又多是老弱残次。诸葛亮写信解释说:“兄嫌白帝兵非精炼,到所督,则

先帝帐下白毘,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当复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诸葛亮集》)此信一直被认为是诸葛亮写给兄长诸葛瑾的,今北大历史系田余庆正确地辨认为是诸葛亮写给李严的。意即接替李严到永安任职的护军陈到所率兵马,乃是刘备生前的帐下卫队,属精锐部队,不是稍加训练的新兵或战斗力弱的老兵和残兵。如果嫌兵力不够,那你李严就把自己管辖的江州地区的兵马调往永安吧。诸葛亮、李严二人之间表面上谈的是永安防务的兵员数量与质量问题,实际上是李严对诸葛亮削去其兵权的借机发泄。此事不久,李严又一次向诸葛亮的权威发起挑战。李严都督江州后,“求以五郡置巴州”,即以巴郡、巴东郡、巴西郡和宕渠、涪陵属国等地区,组成巴州,由他任长官,这等于几乎将蜀汉政权的东部地区全部纳入李严的管辖范围内,诸葛亮看出李严的胃口太大,当然“不许”。

诸葛亮时时排挤和处处压制李严,势必激化他与李严之间的矛盾。不知是出于故意嘲弄还是讽刺挖苦,或是为了缓和与改善同诸葛亮的紧张气氛,李严居然劝诸葛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诸葛亮不得不回答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悔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土,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谨慎”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当初有人劝曹操接受九锡时,曹操道:“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甚大,吾何可比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前后三让,方才受命。相比诸葛亮,曹操的风度显得高雅多了。看来,诸葛亮的人格双重性表现得相当突出,刘备在世时,他是一副面孔,刘备去世后,他又是一副面孔。他的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这一事情上,同样还表现在其他事情上。不管怎样,从以上诸葛亮与李严关于九锡问题上的交锋,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已经开始表面化和公开化了。

李严的才干和资本构成了对诸葛亮的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诸葛亮知道,李严一旦进入权力中心的所在地,他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权力。因此,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一再强调“亲贤臣,远小人”,实际上这里的贤臣主要是指刘备从荆楚带来的“忠贞之士”,诸葛亮列举出的郭攸之、费祋、董允、向宠等人,正是其有力的证明;这里所说的小人主要是指对蜀汉政权怀有二心的原东州势力集团和益州土著集团的官吏。所以,为防不测,诸葛亮不想让出身这两个势力集团的官吏接近

和靠拢后主,不想让出身这两个势力集团的官吏进入最高领导层和核心决策圈。在这种亲疏有别的政治格局下,李严只能无可奈何地呆在江州,自哀英雄无用武之地。显而易见,诸葛亮的气魄和肚量不如刘备宽广。

刘备去世前,诸葛亮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而军事才能则表现平平,不及李严突出和优秀。诸葛亮执政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为表现具有比李严更高超的军事才能,从而在与李严的政治权力较量中占上风,出路惟有北伐,同强魏争斗。否则,李严看不起他,东州势力集团看不起他,连益州土著集团也看不起他。

由此可见,诸葛亮及其荆楚集团要表现和证明自己的实力与信心、胆略与气魄,只有进行北伐,也只能进行北伐。惟其如此,才能树立起自己的声誉和威望,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强有力和不示弱,最终在气势上、心理上压倒和镇服李严与东州、益州等势力集团。这就是诸葛亮北伐中原的又一主要政治因素,也是蜀汉政权内部各派势力集团斗争及其微妙人事关系的必然结果。

三、诸葛亮首次北伐为何选择陇右

平定南中是诸葛亮北伐中原前最重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它以诸葛亮的凯旋班师而告终。南征胜利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安定了后方,“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而是在于:这是诸葛亮独掌大权以来第一次单独统兵作战的精彩亮相,这是北伐中原前的一次成功预演,用意在于表明诸葛亮是有军事才能的,是能够打大仗、打胜仗的。

汉中的地理位置极有利于诸葛亮就近考虑和选择北伐中原的最佳攻击方向和首轮打击目标。为此,他在这里等待和思考了一年时间,“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从地理上看,由汉中北进中原,主要有三条跨越秦岭的路线:一是东面的子午谷通道,全长300多公里,北谷口正好在曹魏关中重镇长安南面不远。二是中间的驻谷道,全长200多公里,北出口即是长安西面的武功县。三是西面的斜谷道,全长近250公里,北出口即是陕西眉县西边。斜谷道中段有一条西出折北的支道,叫箕谷,从箕谷北出散关,即达陈仓。需要说明的是,这几条道路都是途经崇山峻岭,深沟峡谷,艰险异常。当初曹操从关中南下征讨割据汉中的张鲁时,因见路途深险,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诸葛亮与属下谋臣、将军议论北伐路线时,曾经镇守汉中多年、且又熟悉当地情况的蜀汉汉中太守魏延主张:“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毗东方相聚合,

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诸葛亮以为此计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同上)。魏延则认为诸葛亮怯弱,对诸葛亮意见很大。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引起了后世史家的极大兴趣,争论不休。一些史家认为,魏延出的是奇招,假若诸葛亮采纳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的意见,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在古代交通与科技条件下,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子午谷确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再退一步讲,即便魏延顺利地到达子午谷北口的长安,也未必能取得胜利。魏军长于平原作战,骑兵凌厉,且以逸待劳,魏延的疲惫之师极易被其歼灭和打垮。所以,魏延之奇策胜算极小,成功概率极低,故不能采纳,也不敢采纳。如此看来,诸葛亮首次北伐确定以出祁山而取陇右为主攻方向,乃是惟一正确的决策,或者说是利多弊少的决策。显然,做出这样的决策,不能以单纯军事观点出发,还必须考虑政治的、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诸种因素。

当初法正力劝刘备夺取汉中地区的理由是:“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这一战略思想对蜀汉政权影响至深,以至于诸葛亮首出祁山,就选择了“蚕食雍、凉”的进攻路线。曹魏阵营的谋臣将士后来也看出诸葛亮的战略企图:“断凉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据关陇之险。”(《三国志·魏书·陈泰传》)司马昭还嘲笑诸葛亮“常有此志”,可惜未能如愿。

当时雍、凉二州的政治局势完全有理由吸引住诸葛亮的目光。雍州和凉州位于关中平原长安的西面,地势高耸,犹如一只居高临下的猛虎俯瞰着富饶的关中地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华夏崩沸,雍、凉二州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空前罕见的大动荡、大分裂的历史大漩涡之中。眼见皇京烟埃,王纲废弛,一些地方实力人物和自命不凡之士纷纷拥兵自重,招降纳叛,自立为王。如雍州陇西郡太守建就自称“河首平汉王”,聚众抱罕,改元建号,设置百官,割据一方达30余年。远离西陵的敦煌郡因“丧乱隔绝”,郡无太守达20年之久,致使当地地方秩序混乱不堪。

曹操战胜群雄夺取中原后,开始注意关中及其以西地区。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起,他率军先后击败了韩遂、马超、张鲁等军阀和地方割据势力,平定了关中、汉中、陇西、武都等广大地区。于是乎,这些地方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逐渐得到了纠正和廓清。为

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和整顿,曹魏政权开始划小行政区划,在魏文帝之前,“不置凉州,自三辅拒西域,皆属雍州”(《三国志·魏书·张既传》)。曹丕即位后,始置凉州。

虽然曹魏在这些地区逐步建立了政权机构,但由于根基不深,更由于它采取了一些过激政策,政权基础很不稳固。譬如,曹魏为了填补中原和关中地区的人口空缺,往往在新征服的边远地区采取强行迁徙的政策,不惜一切手段,掠取人力。当然,其中也有主动和自愿迁徙内地的,如“武都氏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汉中地区百姓经营魏官吏杜袭“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邕者,八万余口”(《三国志·魏书·杜袭传》)。此外,曹魏在平定雍、凉二州时,有时军事手段过于残酷,如夏侯渊曾屠杀抱罕(陇西郡)和兴国(天水郡)二城,在当地百姓中间落下强烈积怨和极大反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极容易倒向敌方一边。

雍、凉二州“民夷杂处”,豪强大姓势力庞大,离心力大于向心力,这些情况也使得曹魏在这些地区的基层政权极易被倾覆。曹丕即位不久,张掖郡张进执郡守起兵造反,酒泉郡黄华和西宁郡鞠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三国志·魏书·张既传》)。接着,“武威三种胡并寇钞,道路断绝”(《三国志·魏书·苏则传》)。时雍、凉二州诸豪皆驱略羌胡跟随张进等人闹事。面对着如此大规模的叛乱,魏凉州太守张既和金城太守苏则奋力反击,斩杀叛军首领及其支党,河西遂平。不久,“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又是凉州太守张既主动出击,大破叛胡,“斩首获生以万数”。随后,酒泉郡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还是由张既率兵击破之。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西平郡鞠英反,“杀临羌令、西都长,遣将军郝昭、鹿磐讨斩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等。

以上所述,曹魏政权在雍、凉二州的影响和势力伸张状况,雍、凉二州地方豪强势力和羌、氏、胡等少数民族对曹魏政权的不满和反抗程度,曹魏政权在雍、凉二州的政策得失和基层组织的强弱状况等,诸葛亮心里是很清楚的。何况蜀汉政权还有一位曾在雍、凉二州纵横驰骋几十年,“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的马超(《三国志·魏书·杨阜传》),以及曾“率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败后从西南退入蜀汉的白项氏王。诸葛亮完全可以从他们两人及其宗族那里了解到雍、凉二州的许多内情,并且通过和利用他们两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使雍、凉二州的羌、氏、胡势力能够从政治和军事方面与蜀汉政权遥相呼应。因此,后来诸葛亮首伐祁山时,这些豪强势力叛变曹魏,响应蜀汉大军也是有原因的。

由此看来,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因素的深思熟虑,诸葛亮才决心把首次北伐的攻击目标和方向选择在陇右一带,“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三国志·蜀书·蒋魏传》)。诸葛亮认定这个地区是曹魏势力范围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区,且一旦在取成功,不但可以断曹魏右臂,陇上诸郡,非曹魏之有也,使蜀汉拓展境上,获得维持战争所急需的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且还可以截断曹魏与河西走廊及其西域地区的脆弱联系,使蜀汉处于进退有资、高屋建瓴、直逼关中的有利战略地位。公允而论,诸葛亮的这个抉择是英明而正确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确实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抉择了。

对于这个抉择,诸葛亮是满怀信心的。这一点,从首次北伐前夕,后主刘禅下诏的诏书中就可以看出。诏曰:“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优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助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其中特意点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可以看出,诸葛亮在首次北伐前夕,就已经同凉州的羌、氏、胡等20余位地方豪强建立了地下联系,他们做好了积极响应的准备,只待蜀军出山的时机成熟,即将出其不意地“奋戈先驱”。有这些优越的地利与人和条件,诸葛亮又怎能不把夺取雍、凉地区作为首攻方向呢!

四、马谡之死是诸葛亮权力祭坛上的牺牲品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故意“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而他自己则“身率诸军攻祁山”(《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自此,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以来沉寂了9年之久的魏蜀战场,又开始了你死我活的龙争虎斗。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中写道:“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这段史料所包含的信息量说明:首先,诸葛亮当时的知名度远低于刘备,魏国朝野普遍对诸葛亮的军事能力不摸底,也未发现他有什么军事才能。其次,诸葛亮首次北伐实现了战役的突然性和隐蔽性,收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初步效果。再者,首次北伐的攻击方向选择准确,雍、凉二州确系曹魏势力范围和防务系统链条中的最薄弱的环节,蜀军出手一击,正中要害。故曾深受曹魏屠城和强迁之苦的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同时“叛魏应亮,关中响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在诸葛亮的统率下,蜀汉大军“戎阵整齐,赏罚严而号令明”,来势汹汹,大有志在必得之慨。然而,出乎意

料,这次经过多年精心准备的北伐却令人痛心地上失败了。而造成失败的罪魁祸首,正是诸葛亮亲自选拔的先锋马谡。

马谡,襄阳宜城人,从荆州随刘备入蜀,“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但善于识人的刘备认为他“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告诫诸葛亮“察之”。诸葛亮掌权后,以马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三国志·蜀书·马谡传》),两人私交甚厚,犹同父子。诸葛亮南征时,马谡送之数十里。针对南中险远,蛮夷易反复的情况,他建议诸葛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诸葛亮采纳了他的谋略,获得成功。首次北伐前,在谁为蜀军先锋的人选上,大家都看好魏延和吴壹,岂料诸葛亮出人意外地选中了马谡。这样,作为诸葛亮亲信的马谡,被诸葛亮以幕后的丞相参军推到了前台任大军先锋。诸葛亮的用意无非是给马谡一个表现的机会,为以后进一步提拔和重用创造条件。可惜的是,马谡不争气,辜负了诸葛亮的一片好心和满腔希望,街亭一仗,大败而归。让我们看看史书是怎样记载的:

①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郤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郤所破……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②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

——《三国志·蜀书·马谡传》

③建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众,率将士而还。

——《三国志·蜀书·王平传》

④亮使参军襄阳马谡、裨将军巴西王平及张休、李盛、黄袭等在前,违亮节度,为郤所破,平独敛众为殿,而云、芝亦不利。亮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戮谡及休、盛以谢众,夺袭兵,贬云秩,长史向朗不时臧否免罢;超迁平参军,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统五部。

——《华阳国志·刘后主传》

⑤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

——《三国志·蜀书·向朗传》

⑥太和二年,蜀相诸葛亮出祁山,遣将军马谡至街亭,高详屯列柳城。张郃击谡,淮攻详营,皆破之。

——《三国志·魏书·郭淮传》

⑦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

谡于街亭。谡依山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应亮,郃皆破平之。

——《三国志·魏书·张郃传》

从以上史料获知:第一,马谡至少掌握着五支部队,除本部兵马外,还直接指挥王平、张休、李盛、黄袭等部兵马。马谡手下兵多,正所谓“统大众在前”。第二,马谡失败的原因在于“舍水上山”,被魏将张郃截断了水源,造成军心动摇,“士卒离散”,张郃乘虚击破之,蜀军全面溃败。第三,说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这种指责恐难成立,难道前方指挥员连一点自主权都没有吗?

马谡大败街亭的时候,诸葛亮在哪里呢?其实他就在街亭附近。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之在街亭也,前军大破,亮屯去数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三国志·明帝纪》亦证实此点:“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亮败去,三郡平。”就是说,马谡军营与诸葛亮军营相距不过数里,但不知当时诸葛亮为何不能前往相救。

街亭,乃兵家必争之地,是古代连接陇右与关中地区的咽喉地段。谁控制了它,谁就拥有了控制陇右的主动权。所以,街亭之败,引起蜀军全线溃退,造成蜀军开战初期创立的大好局势丢失殆尽,诸葛亮感到“进无所据”,只好退军还汉中。至于已经招降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曹魏重新据之。于是,声势浩大的首次北伐,以诸葛亮的失败急速地降下了帷幕。

诸葛亮在首次北伐前夕发表的《前出师表》中曾经气壮山河地表态:“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既然承诺已经发出,就必须兑现。诸葛亮的“治臣之罪”是自贬三等,“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而“告先帝之灵”的呢,却是马谡的首级。

马谡该不该杀,也是后世争论较多的问题。马谡有错有失,这是毫无疑问的,任何人也否认不了。问题在于他的过失是否到了必须掉脑袋的地步?据史书记载,当时诸葛亮手下有两位跟他相当亲近的人就此表示过反对意见:一个是丞相参军李邕,刑前苦谏;另一个是留在成都丞相府为诸葛亮管家的参军蒋琬,深表惋惜。诸葛亮解释道:“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三国志·蜀书·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诸葛亮的这番表白,在历经千年的历史上不知感动了多少后人,他们据此把诸葛亮捧为治军严明的典范,而可怜的马谡则成为这个祭坛上的供品。

真正开始比较深层次探讨诸葛亮杀马谡缘由的是清朝人何焯。他说:“魏延、吴壹辈皆蜀之宿将,亮不用为

先锋,而违众拔谡,其心已不乐矣。今谡败而不诛,则此辈必益晓晓,而后来者将有以借口,岂不惜一人而乱大事乎?”(《三国志集解》注引何焯评说)何焯的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轰轰烈烈的首次北伐为何失败?诸葛亮若拿不出像样的答复和交待,不但在刘禅面前说不过去,在满朝文武大臣面前说不过去,就是在荆楚集团内部也说不过去。魏延之流本来就对诸葛亮“违众拔谡”意见很大,只是苦于没有口实发难,现在既然把柄送上门来了,他们岂肯放过?

在笔者看来,还有一层更深的的原因需要揭示出来。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诸葛亮与李严两位托孤大臣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日渐公开化和表面化。诸葛亮首次北伐的全过程,李严均未参加,他对北伐持何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史无记载。但是,既然两人关系紧张,诸葛亮又千方百计地压制和排挤李严,依李严之政坛经历和能力,他肯定会寻机反扑的。如今,诸葛亮倾全国之力而发动的首次北伐遭到失败,李严势必会抓住大做文章:马谡是谁点的将?诸葛亮丞相究竟负多大的责任?李严甚至还会进而相逼:你诸葛亮究竟有没有能力治军?究竟能不能打仗?须知,李严不仅是托孤副手,而且背后还站着整个东州集团,再加上魏延等人,代表着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因此笔者认为来自李严的挑战,对诸葛亮构成的威胁性才是最强大的,也是根本性的。

虽然诸葛亮在检讨首次北伐失败的原因时,承认“授任无方,明不知人”,但他知道,这种隔靴搔痒的解释瞒不过李严那帮老练的政客们,也平息不了反对派的强烈不满情绪;惟有牺牲马谡——把失败的责任统统推到马谡及其将领身上,诸葛亮自己才能摆脱困境。这就是说,马谡不杀,反对派就不会放过诸葛亮,他自身的威信和地位也很难稳定和巩固。只有舍掉马谡这个车马,才能最终保住诸葛亮这个主帅。马谡当然深切了解诸葛亮的难处和苦衷,知道诸葛亮已经顶不住各方面的压力。因此,他主动上书诸葛亮:“明公视谡犹子,视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诸葛亮十分清楚马谡实际上是替他受过,从而使他平安地渡过了险些由军事危机而诱发出的更大的政治危机。所以,马谡死后,内心充满愧疚的诸葛亮亲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三国志·蜀书·马谡传》注引《襄阳记》)。由此可见,马谡在很大程度上是诸葛亮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五、《后出师表》是诸葛亮首次北伐失败的遁词

首次北伐的失败,给诸葛亮的信心以相当沉重的打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后出师表》中看出。譬如,他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

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意思是说,曹操那样智谋高超的人都吃过多次败仗,而我这个才弱的人首次北伐失败,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又说:“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胜?”意思是,既然曹操看人、用人都有过失,那我选错马谡为先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就不可以原谅吗?总之,整个《后出师表》给人的感觉是,以承认曹操为能,并犯有种种过失的前提下,为自己的首次北伐失败反复地进行辩解和开脱,其基调的低下,与《前出师表》形成鲜明的对照。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有些后人怀疑《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所作,但从诸葛亮的性格、心态和官场处境来看,笔者认为确系诸葛亮所作,因为只有诸葛亮本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任何他人都无法获得和取代诸葛亮那样身临其境的经历和感受。

首次北伐的失败,暴露出诸葛亮治军能力和指挥能力方面的许多弱点。回师后他总结经验教训,强调“校变通之道于将来”,决心“减兵省将”,改变呆板的战略战术,增强灵活性和变通性。另一方面,诸葛亮还“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晋春秋》),积极准备再次北伐。不过,对诸葛亮来说,北伐的最好时机,已经永远地丧失了。因为诸葛亮的北伐不可能再次获得突然性和隐蔽性的战役效果,他的对手再也不可能措手不及。此时,从关中震响中清醒过来的曹魏政权已经迅速改变雍、凉二州软弱的军事状况,把两国边境上出现的漏洞,竭尽全力地补齐和填实,诸葛亮已经难以找到空隙可钻了。所以,诸葛亮首次北伐的失败,已经昭示着后来北伐灰暗的前景,意味着蜀汉证券已经被封杀在巴山蜀水之间。

诸葛亮原想通过首次北伐,一来化解蜀汉政权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战争来掠夺财富和人口,以缓解蜀汉政权内“三大山头”的利益分割冲突;二来转移朝廷内外的注意力,在兴复汉室的旗帜下,增强全国上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想树立个人威望,强化和突出他个人的中心地位。但是,首次北伐后的诸葛亮这些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例如,他与李严权利之争的矛盾就依然存在着,并暴露了北伐战略的企图,为后来的北伐留下了隐患。

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惟一收获是带回了姜维。史称:“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余家及维等还”(《三国志·蜀书·姜维传》)。姜维,天水冀城人。在水天,姜姓家族极有势力。姜姓为四大姓之首,故势力在水天郡当为最大。在东汉时代,大姓子弟在当地各级行政机构中,

通常享有优先任用为官的特权。姜维之父曾为郡功曹,死于战场后,姜维又被选拔为官中郎,参本郡军事等。显然,诸葛亮还有更深的考虑:抓住姜维,等于抓住了天水,凭借姜姓大族的影响,一则可以更好地贯彻《隆中对》提出的“西和诸戎”的政策,二则可以为以后的北伐减少障碍,扫除麻烦。对此,姜维也信心十足,“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或许有人会问:诸葛亮为何非要北伐?不北伐就不行吗?对这个问题,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是这样回答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峻而紧迫,认为“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代之?”所以,必须北伐,不北伐不行。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又从人才多寡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北伐的理由:“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二也,当何以图敌?”平心而论,诸葛亮的这个看法还是比较合乎清理的,因为荆楚集团是一个扩张性、好战性较强的武装集团,倘若这些骨干一批批地逝世和阵亡,以后诸葛亮又靠谁进行北伐,又去哪里找这些忠贞之士呢?尽管诸葛亮也吸纳一些益州人士参加蜀汉政权,但骨子里他是瞧不起益州人士的,可以“用”,但不能“重”。所以,如要仅以荆楚骨干的存活率来看,所谓“危急存亡之秋”的强调,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从客观现实看,不进行劳师远征的北伐也是可以的。

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个表现欲极强的政治家,首次北伐不过是掀开了后半生事业的第一页。也许结局如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诸葛亮通过北伐这种方式向当时的华夏社会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当时几乎所有的目光都被陇右地区蜀魏边境的战事吸引过去了,昔日荒寂的山岭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毫无疑问,这是诸葛亮创造的杰作。如果说,首次北伐前的大量准备工作,表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才能、谋略手腕和权力技巧的话,那么首次北伐的失败和后来北伐屡战不爽的过程则显露了诸葛亮军事才能的不足。在这段三国混战的历史与诸葛亮人生波澜的横截面上,包藏着如此丰富的信息,人们又怎能不对诸葛亮的首次北伐充满特别的兴趣呢?

作者: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明金